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DANGDAI ZHONGGUO JINGJI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375印张 12插页 440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7190·104

《当代中国》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编

邓力群 马 洪 武 衡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

于光远 王惠德 朱穆之 许涤新
华 楠 杜润生 谷 羽 张友渔
周 扬 周克玉 林涧青 房维中
胡 绳 贺敬之 袁宝华 梅 益
薛暮桥

《当代中国》丛书 编 辑 部

杜 敬 丁伟志 王焕宇 边春光
陈伯林 吴家珣 张 定

《当代中国经济》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马 洪 刘国光 杨坚白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耕今 田江海 孙尚清 沈立人

李成瑞 李学曾 杨圣明 张卓元

周叔莲 项启源 柳随年 梁文森

诸班师 董辅礽

《当代中国经济》作者

第一章至第七章 杨坚白

第八章至第十章、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 李学曾

第十一章、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 杨圣明

总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已经整整三十五个春秋。

当此之际，我们决定把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加以总结，编纂成书，陆续付梓，以献给这一伟大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到这一事业中来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全国各族同胞和世界上一切关心我们事业的朋友们。

在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我们当代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最辉煌的篇章。这个时期，中国大地上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各项事业的兴旺，人民的团结，都是空前的。我们并不满足于既有的初步成就，并不想以此矜夸于人，但是我国人民通过三十多年的实践，确实重新建立了充分的民族自信。实践本身向全世界宣告，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恢复了和勃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完全有能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扎实扎实，以比较高的速度，迎头赶上，

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其所以艰苦卓绝，一则是因为我们的基础太差，起点太低；二则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如何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不仅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无成例可援。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但从根本上来说，却只有靠我们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独立地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以无畏的革命创造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找出一条中国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这样，振兴中华的大业才会事半功倍，卓有成效。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建国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这同样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此贡献了智慧，付出了劳动，备尝了失误的苦痛和成功的欢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制订和完善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许多新的创造，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一九八二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又是我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通过全体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指日可待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我国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经验，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介绍给世界人民。我国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贵教益，国外一切关心中国的人也能够由此增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这就是我们编撰出版这套《当代中国》丛书的主要目的。

《当代中国》丛书，将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

写出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建设史，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信史。我们深信，只要把三十多年建设的成功和挫折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一加以科学的总结，那就会使之成为传诸后世的国宝。

当然，任何珍贵的历史经验，都不应变成妨碍人们继续前进的沉重负担。我们不仅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也不能为成功的经验所束缚，而故步自封。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以智慧。现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进行经济改革和技术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重大的新课题，显然是不可能从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们的任务在于，正确运用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以便用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的革新精神，去迎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日

凡例

一 《当代中国》丛书所论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历史过程和经验。为了说明问题，许多卷书以专章，或在绪论及某些章节中，简要地论述了旧中国的有关情况。

二 按内容，本丛书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综合性的，如《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等；第二类，部门、行业性的，如《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的轻工业》、《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等；第三类，专题性的，如《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土地改革》、《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第四类，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编写的地区性的，如《当代中国的北京》、《当代中国的四川》、《当代中国的西藏》等；第五类，人物传记，如《毛泽东传》、《董必武传》、《刘伯承传》等。各卷在出版顺序上不按类别安排，先完稿的先出版。

三 这部丛书共约二百卷，每卷一册，少数卷分上、下册。

四 部分卷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五 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但不尽相同。一般采用编、章、节的形式，有的则不完全是这三个层次；多数卷写有《前言》、《后记》或《绪论》；多数卷编有《附录》，但内容不尽相同。

六 凡附有人名索引者，人名均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七 书中译名，人名采用国内通用译法，并参照辛华编的《世界人名译名手册》；无通用译法者，按“名从主人”原则译出。地名根据地图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并参照辛华编的《世界地名译名手册》；自行译出者，仍遵“名从主人”原则。

八 书中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图，根据地图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绘制；我国古代地理区划图，参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

九 书中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十 书中统计数字的使用，遵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有关规定。

十一 书中所用科学技术术语、名词、名称，以有关方面审定的为准；未经审定和统一的，从习惯。

十二 书中字体，除必要时使用繁体字外，一律用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

十三 书中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者以外，一般用阿拉伯数字。

十四 书中注释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不编通码。

序　　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揭开了当代中国新的一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一个备受欺凌、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围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特权，肃清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没收了官僚资本，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了帝国主义的、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从而达到了解放生产力的目的。一九五二年底，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前景，带来了勃勃生机。三十七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一九五二年为基期，社会总产值一九五二年为1,015亿元，一九八五年为16,242亿元，年递增8.4%；

工农业总产值一九五二年为810亿元，一九八五年为13,269亿元，年递增8.6%，其中，工业总产值从一九五二年的349亿元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8,759亿元，年递增11%，农业总产值从一九五二年的461亿元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4,510亿元，年递增4.6%；同期的国民收入则从一九五二年的589亿元提高到一九八五年的6,765亿元，年递增6.6%。^①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是罕见的。众所周知，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日本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我国却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如果不是这样，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肯定要比现在大得多。

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五分之一多的人口，基本上解决了十亿多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我国农业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化。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主要农产品在世界上的位次，粮食保持第2位^②，棉花由第2位上升到第1位，肉类由第3位上升到第2位。我们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规模比较宏大的现代工业，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我国工业发展是很快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五年，主要工业产品在世界上的位次，钢由第26位上升到第4位，煤由第9位上升到第2位，石油由（一九五〇年）第27位上升到第6位，发电量由第25位上升到第5位。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不断扩大，物价基本稳定，市场日益繁荣。我国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已经和

^① 各项年递增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八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年度增长率和《中国统计年鉴（1985）》的有关指数计算。

^② 1952年我国粮食产量居世界第1位。

世界上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已经把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经济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实践所证明的一条真理。

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上两次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前者标志着中国的新生，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后者反映了中国人民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走过曲折的道路，既有顺利发展的成就，又有摸索前进的波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七年来，总的来看，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伟大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恢复了遭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在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下，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成了包括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化学及军工等在内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冬，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经济上的“左”

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经济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大跃进”带来了农业生产和以后两年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跌，经济效益的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我们党总结了经验，纠正了经济工作上的“左”的错误，认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农轻重比例关系趋向协调，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商品供应情况大有好转，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但是，正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胜利前进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却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改变了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破坏捣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企业亏损严重，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下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一九七六年十月，我们党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定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经济建设实现了重大的战略转折。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大的比例关系趋向协调，流通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繁荣，对外经济活跃，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在调整、改革和整顿中稳步前进，欣欣向荣。一九八四年十月，党的十二

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突破长期形成的僵化和封闭的模式，朝着有生机、有活力和开放的社会主义新体制的模式转化。

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曲折过程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既是伟大的，又是艰巨的。特别是在象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可借鉴，我们的经验不足，也不能照搬别国现成的经验，只能依靠自己摸索前进。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平坦的，发生失误是难免的。可以预期，通过实践和经验总结，我们必定能够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必将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证明，能否正确地处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经济能否顺利发展。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商品经济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就顺利，就迅速，经济效益就好；相反，如果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看作是互不相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对立的东西，片面理解计划经济，否认商品经济，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我国经济发展就迟缓、停滞，经济效益就差。我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七年，面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实行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比较重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市场机制得到较好的发挥，因而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成就，人民得到了实惠。六十年代经济调整时期，在理论上肯定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仍应起作用，在实践上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

集市贸易，注意运用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因此就迅速恢复和发展了被“大跃进”破坏了的国民经济。而在“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内乱时期，否认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否认市场机制，结果经济发展就倒退和停滞。正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内在统一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又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总结。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看作不具有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从而把它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产品经济论”，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为直接满足自身需要而生产的大工厂，基层生产单位只是这个大工厂的不具有经济独立性的车间，它们的微观经济活动由中央计划机关指挥，它们之间的产品流转实行统一调拨。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产品经济的认识和做法，促使每个地方、部门以及每个单位追求各自的“大而全”、“小而全”。它抑制了在现代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企业活力，从而使整个经济缺乏生气。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传统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模式相比，有许多不同点。一是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传统模式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限制或取消个体经济，急于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企图建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则承认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而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的现实情况，强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二是表现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方面，传统模式实质上否认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社会产品的商品属性，因而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

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认，不论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都具有商品属性，企业，包括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自身的合法权利。三是表现在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方面，传统模式是宏观直接调节微观，国家通过包揽一切的指令性计划实现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和控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国家直接管理，但它的侧重点在于国家对社会需求和市场的管理，对各种经济杠杆或市场参数的灵活调节，以此来影响和引导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用间接调控的方式来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四是表现在经济联系方式方面，在传统模式下，生产要素的流动、组合和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国家调拨，纵向分配，横向经济联系很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化了经济的横向联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体系为中介，通过地区、部门和企业多种多样的联系方式，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五是表现在收益分配方面，传统模式把社会主义占有关系的平等视同收益平等，把平等混同为平均，结果导致平均主义泛滥，劳动效率降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承认基于劳动贡献大小而产生的收入差别，这既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竞争法则，并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而后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由此可以看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充满活力而又能够实现有计划发展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论断，既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又表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根本不同，有着明显的特点：一是体现的生产关系不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